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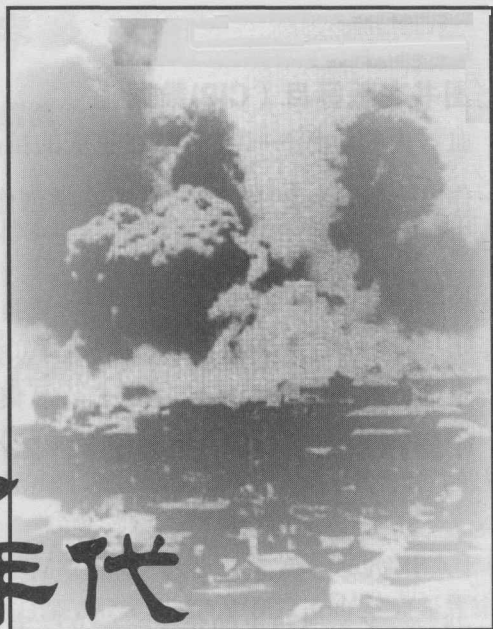
血与火的年代

——文学家在重庆的抗战岁月——

颜坤琰 著

作家出版社

血与火 的年代



——文学家在重庆的抗战岁月——

颜坤琰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标目 (CIP)数据

血与火的年代——文学家在重庆的抗战岁月/颜坤琰 著.——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12 (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丛书)

ISBN 978-7-5063-8958-6

I. 血… II. 颜… III. 文学综合作品集—中国—当代IV. 1258. 8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73726号

书 名: 血与火的年代——文学家在重庆的抗战岁月
作 者: 颜坤琰
出 版: 作家出版社
发 行: 作家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东黄城根南街10号 (邮编: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版监审: 张水舟

图文总监: 侯秀芬

责任编辑: 王宝生

特约编辑: 黄光平

图文总监: 刘 方

开 本: 重庆大正印务有限公司

印 张: 18印张 360千字

印 数: 0001-1000册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3-8958-6/ I . 588

定 价: 3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血与火的年代

——文学家在重庆的抗战岁月》

内 容 梗 概

八年抗战期间，有上千的诗人、作家、艺术家、文艺理论家云集陪都重庆，绝大部分人都过着艰苦窘迫的战时生活，但他们无怨无悔。他们顶着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为抗战事业奔波在山城崎岖的街巷；他们在如豆的油灯下书写檄文，对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口诛笔伐；他们用掷地有声的文字唤起民众，与法西斯进行殊死的搏斗；他们用满腔的热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为民族的解放，为抗战的胜利，默默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我们不应忘记这些文艺家当年在重庆留下的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不应忘记他们在山城为抗战呼号呐喊的身影。本书便是记述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当年在陪都生活的行止，包括他们在重庆的行踪，他们在重庆的各种社交活动，他们的感情生活以及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实际上就是他们人生历程中的一个精彩片断。

本书广征博引，钩沉发微，查档案，访遗址，据实为文。既可供读者阅读欣赏，回顾那段已逝去的烽火岁月，不忘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这场空前绝后的苦难；也可供现代文学研究者，作为查找历史资料的案头必备之书籍，探幽寻迹，唾手可得。

全书约36万字，插图100余幅。

作者简介

颜坤琰，重庆荣昌人，男，汉族，1939年3月出生，大专文化；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退休前在重庆啤酒集团公司工作，曾任分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少年时代爱好文学，八十年代开始业余写作，出版酒文化专著两部：《啤酒趣话》（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993年）、《世界啤酒大典》（重庆出版社出版，2001年）。退休后主要从事文学家传记故事创作，先后在《人民政协报》、《名人传记》、《世界文化》、《读者》、《红岩》、《文史春秋》、《今日重庆》、《红岩春秋》、《重庆政协报》等中央和省市报刊，以及美国《侨报》发表作品百余篇。

《世界啤酒大典》获2002年重庆市首届优秀科普作品二等奖。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序

杨耀健

《血与火的年代》一书，以纪实文学的手法，反映抗战时期的主流文艺工作者在重庆的活动。

抗战时期是一个血与火的年代。由于外敌入侵，文化人同处一种境遇，即烧焦的土地、血染的山河、悲苦的呻吟、反抗的怒火。他们都共有一种身份，即流亡者，逃亡又逃亡，流浪又流浪。这种处境与身份，给予他们心理及精神上的震动与撞击，不是亲身经历者是很难体验得到的。因此，他们不仅具有民族解放意识，而且具有战斗意识。就个人而言超越了自我，就阶级而言超越了阶级，就民族而言超越了民族乃至种族的界限。

抗战时期云集重庆的文化人，包括了不同政治观、社会观和文艺观的文化人士和文化派别。正如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所写道的：“哥哥妹妹，之乎也者，鸳鸯蝴蝶，都是文艺统一战线的成员。”在抗日救国前提下，团结了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文化人，结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到重庆的，不仅有后来投奔延安的曾克，还有“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语丝”派的林语堂，乃至同情中国抗战的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等人。

在此前出版的部分文艺工作者的传记中，对他们在重庆时期的生活，往往叙述得比较简略，不是一笔带过，就是语焉不详。本书作者查档案，访遗址，广征博引，钩沉发微，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补充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

《萧红在重庆》，披露了萧红之所以要去香港，是希望找到一张平静的书桌，以便安下心来写点她梦寐以求的有厚重感的作品。《抗战时期周恩来对胡风的教诲与关怀》，讲述了董必武奉周恩来之命，找胡风调解他与周扬的宿怨。《萧红与胡风的恩恩怨怨》，反映了这两位鲁迅门生早年和睦相处，情谊深厚。抗战期间，他们却又因一些误解而积怨颇深，几近反目。《抗战时期张恨水励志丹青赠老友》，告之张恨水不仅小说写得好，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尤其对国画情有独钟。通过《郭沫若磐溪慰问徐悲鸿》，我们读到一个很沧桑又很温暖的人间故事，记起苦斗、情谊与信义，并非来自遥远。《巴金与曹禺的陪都情谊》，则使我们重温老一辈文化人赤诚相见，风雨同舟的经历。《抗战时期金庸在重庆》，介绍了新派武侠小说大师金庸与重庆的渊源，点出了他的根底。

从文化成果的主题意蕴来看，民族解放与民众解放的要求，构成了绝大部分抗战文化的主题思想。这样的意蕴，大大强化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主题。

随着抗战军兴，中国文化人在时代感召下，走出书斋和“象牙之塔”，集合在民族解放旗帜下。他们自觉改变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迅速打破原有的文化体系、

文化圈子以及文化派别的对立局面。他们先后组建了一系列文化团体，诸如文化界救国联合会、戏剧界抗敌协会、电影界抗敌协会、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等，创办了诸如《救亡日报》、《七月》、《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刊物，撰写了一批短小精悍、以反映抗日救亡为主的文章和文艺作品。斯时，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国防文学”一齐转入抗战文化运动。

《活跃于陪都文坛的才女赵清阁》、《秦瘦鸥在重庆的日子》、《抗战时期徐迟与中共领袖的交往》、《林斤澜求学记》等篇什，正反映了不同作家在重庆接受的洗礼。

《血与火的年代》配有不少珍贵老照片，图文并茂，厚重扎实，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我们对抗战文化人的感知，开卷有益。

爰为序。

2013年12月于星月湾

目 录

序

郭沫若磐溪慰问徐悲鸿·····	1
陪都三月·····	4
巴金与曹禺的陪都情谊·····	17
巴金在重庆结识周恩来、毛泽东·····	21
巴金为抗战呐喊为正义呼号·····	25
忆巴金·····	41
老舍赴江津探望陈独秀·····	47
老舍的抗战人名诗·····	50
老舍喜作嵌名联·····	59
老舍与青年女作家曾克的友情·····	63
冰心的歌乐山岁月·····	67
毛泽东赞胡风做了很多有益的事·····	91
周恩来对胡风的教诲与关怀·····	98
为胡风镌刻历史·····	113
艾青陪都纪事·····	119
林语堂回重庆的前前后后·····	134
张恨水与陈独秀的一段友情·····	162

张恨水励志丹青赠老友·····	172
萧红与胡风的恩恩怨怨·····	181
踏访萧红在白沙的踪迹·····	198
寻访萧红歌乐山旧居·····	211
嘉陵江畔忆鲁迅·····	214
萧红在重庆·····	224
萧军与重庆的一面之缘·····	247
端木蕻良情系重庆·····	252
徐迟与中共领袖的交往·····	269
秦瘦鸥在陪都重庆的日子·····	279
活跃于陪都文坛的才女赵清阁·····	285
金庸在重庆·····	321
林斤澜陪都求学记·····	332
海明威的重庆之行·····	338
后记·····	354

郭沫若磐溪慰问徐悲鸿

1945年2月，陪都重庆依然春寒料峭。月初的一天，郭沫若特意从市区来到嘉陵江北岸的磐溪石家祠堂中国美术学院，探视病中的徐悲鸿，当时徐悲鸿正患高血压未愈。徐悲鸿对郭沫若的到来格外激动和兴奋。郭沫若说，他还带来了周恩来先生的关心和问候，徐悲鸿更是喜不自禁。郭沫若说，周先生实在很忙，托他转赠周先生从延安带来的红枣和小米。说着，郭沫若将两个纸包交给徐夫人廖静文女士。徐悲鸿抚弄着红艳艳的枣子和黄灿灿的小米，脸上充满了喜悦，充满了感激，虚弱的病容一扫而光。“请代我向周恩来先生致谢；而你也不辞路远亲自送来，真叫我受之有愧。”徐悲鸿动情地对郭沫若说。

随后，两位老朋友便围着小火盆亲切地交谈起来。询问过病情后，两人又谈起了陪都文化界的现状，谈起了当前的时局。徐悲鸿流露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他们都希望能组成有共产党参加的、更利于抗战的民主联合政府，还老百姓自由与民主。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45年春，国内一些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在此背景下，郭沫若有感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起草了一篇《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以下简称《进言》——作者注），呼吁成立有共产党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呼吁取消特务组织，还人民以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提出中国的时局应该改弦易辙，召开各党派、公正人士参加的“国是会议”，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并提出六条实现民主的要求。随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员便分头出动，去征求陪都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意见，并征集他们的签名，以充分显示文化界的力量。郭沫若自然想到挚友徐悲鸿。这时，郭沫若便从衣袋里掏出一份文稿，题目就是《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徐悲鸿接过去急切地读着，精神为之一振，那一句句一行行，都是全国民众的共同呼声呵。许多知名人士都在这篇《进言》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待郭沫若说



病中的徐悲鸿



《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的签名部分

明缘由后，徐悲鸿毫不犹豫地立即提笔在《进言》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夫人廖静文也毅然决然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徐悲鸿夫妇执意挽留郭沫若吃了午饭再过江，廖静文立即下山去买了一瓶泸州大曲和几样下酒菜。徐悲鸿因病不能饮酒，郭沫若便笑着说，那就只有和弟妹廖静文对饮了。当时没有酒杯，便用茶杯盛酒。廖静文是从来不喝酒的，为了让郭沫若喝个痛快，一时兴奋的廖静文只得舍命陪君子了。郭沫若异常兴奋，一边畅饮醇香浓郁的大曲酒，一边与徐悲鸿谈笑风生。徐悲鸿说：“我很敬重郭先生，不顾个人安危，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国统区的核心，写下这样的战斗檄文！”郭沫若说：“你也不是把生命置之度外，在檄文上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大名吗？”两人相视大笑。郭沫若诗兴大发，即席挥毫作了一首七绝：

豪情不让千钟酒，

一骑能冲万仞关。

仿佛有人为击筑，

磐溪易水古今寒。

徐悲鸿望着郭沫若那昂扬悲壮的诗句、那行云流水般的书法，不由得和廖静文一齐朗诵起来，三人其乐融融。突然徐悲鸿不甚感慨地说：“对不起啊，我手腕没有力，不能作画了。要不然我真想当场为你作一幅画，以纪念我们今天相会的情景。”郭沫若听了哈哈大笑说：“留着吧，来日方长。”

郭沫若起身告辞时，一再叮嘱徐悲鸿要多多保重。徐悲鸿因病体虚弱不能远送，便嘱夫人护送郭沫若到嘉陵江石门渡口乘渡船过江，并要廖静文看见郭先生上了船后再返回。

十多天后，2月22日的《新华日报》《新蜀报》刊登了《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全文和312位陪都各界著名人士的签名。它的发表，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地反响，也震动了国民党政府。后来有人通报说，蒋委员长看了《进言》龙颜大怒，把主管文艺的头目张道藩找去大骂了一通，张道藩下来就逼迫一些人撤回签名或登报否认。徐悲鸿也遇到了张道藩爪牙的威胁，说，如果不登报否认，将不保身家性命！当时有一位费巩教授，签名后便在朝天门码头被捕，随即便被杀害——抛入硝酸池内活活烧死。但徐悲鸿却毫不动摇，在危急关头，徐悲鸿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家的良心和胆识，确实

令人感动，令人钦佩。

为了使郭沫若放心，徐悲鸿让廖静文进城去告诉郭沫若，说无论出现任何情况我们都不会动摇，请他放心。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热情地挽留廖静文在他们家吃午饭，饭后她便要赶紧回磐溪。由于磐溪在远郊，回到家时已暮色苍茫。廖静文对徐悲鸿讲了郭沫若对他们的感激和鼓励，夫妻俩都十分兴奋。

说起徐悲鸿与郭沫若深厚的友谊，两人不由得忆及一个多月前他们燕尔新婚时的情景。婚礼是在七星岗黄家垭口的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郭沫若和沈钧儒是证婚人，郭沫若事后还作了一首诗，并亲自书写在一张红色金箔纸上，裱好送给他们，以示庆贺。其诗如下：

嘉陵江水碧于茶，
松竹青青胜似花。
别是一番新气象，
磐溪风月画人家。

落款是郭沫若于立群贺，这给他们的新婚增添了很多光彩和欢乐。

新婚后的徐悲鸿是愉快和幸福的。他不止一次地对廖静文说：“我真正找到了我所爱的人！除了你，没有人能对我有这样真诚、坚定、纯洁、无私的爱情，我用什么来报答你呢？”“我欠着你的情分，我要把我最珍贵的东西都送给你。”徐悲鸿决定把他十分珍爱且比较满意的一些作品，全部送给廖静文，写上她的名字。这段姻缘对徐悲鸿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为了与廖静文结合，他以现款 100 万元、古画 40 幅、自己的作品 100 幅及每月收入的一半，作为儿女抚养费的“代价”，与前妻蒋碧微离了婚，并于 1945 年 1 月与比他小 28 岁的廖静文结婚。

(2007 年 2 月 25 日完稿)



磐溪中国美术学院暨徐悲鸿寓所旧址

陪都三月

——茅盾初次赴渝纪事

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抗战时期曾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工作、生活多年。他们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对当时的重庆有过如下的描述：“重庆是一个风云际会之点，是一个具有夸张的地理意义的临时宿营地……重庆是一个成千上万人分享过的插曲……大人物和小人物，高尚者和贪污者，勇敢的人和胆小的人，都曾在重庆聚会过一下。”不错，抗战期间的重庆是个人文荟萃之地，她是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著名文学家茅盾也来到了重庆，不过，他不是陪都过客，他是肩负着组织赋予的使命来参加战斗的；为抗击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为民族解放，为民主自由，他以如椽之笔作刀剑，向日寇、向反动派无情地砍去。

一 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1940年11月下旬，茅盾夫妇搭乘董必武的“专车”，从延安抵达陪都重庆。这年5月，刚从新疆土皇帝盛世才魔掌下逃出来的茅盾一家，辗转来到延安。本欲在陕甘宁边区扎根的茅盾，在延安生活了五个月后，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电召，要他到国统区工作，以发挥他更大的作用；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向茅盾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茅盾表示绝对服从组织安排。于是，他把一对儿女留在延安学习，携夫人孔德沚南下重庆。

到重庆后，茅盾夫妇住进了重庆近郊的化龙桥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这是座落在由红色页岩组成的小山坡上的一幢三层楼房，这里被人们称作红岩村，办事处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住在这里；周恩来和部分工作人员，住在城里的曾家岩五十号，人称“周公馆”。

第二天，周恩来和邓颖超来看望茅盾夫妇，向茅盾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对茅盾今后的工作也做了安排。周恩来说：“请你来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是给你穿上一件‘官方的外衣’。委员会的实际工作自有别人去做，不会麻烦你的，你还是发挥你作家的特长，用笔来战斗。听说生活书店打算把《文艺阵地》迁到重庆出版，想请你继续担任主编，你可以考虑，大概徐伯昕会找你谈的。编刊物扩大进步文艺的影响，团结和教育群众，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压迫愈严重，我们愈要针锋相对

的斗争，同时，也愈加要讲究斗争艺术。有一些情况徐冰同志会向你介绍的。”

当天，办事处的徐冰就向茅盾介绍了重庆、以及整个大后方文化界斗争的大致情况，并送了一些材料给茅盾看。徐冰告诉茅盾：“住房已经找好了，就在沈钧儒住那地方。不过，因为重庆特务横行，鹰眼密布，不宜从办事处直接搬到那里，打算让你先到生活书店暂住几日，过渡一下。”

第三天，茅盾夫妇就搬到市中心民生路、生活书店门市部楼上临时腾出来的一间小房内。他们刚把简单的行李安顿好，邹韬奋和徐伯听就来了。茅盾与他们已阔别三年，自然要谈的话题甚多。邹韬奋关心杜重远，向茅盾详细了解了杜重远在新疆蒙难的经过，也询问了与茅盾同时逃出魔掌、且一道赴延安的张仲实在延安的工作和生活。邹韬奋还向茅盾讲述了生活书店的困难处境。抗战初期，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开设了五十余个分支店，现在却只剩下重庆的总店，和贵阳、桂林、香港三个分店，其余的都在这两年内横遭国民党当局查封了。不少工作人员无辜被捕，有的甚至生死不明……。蒋介石还想以高官厚禄收买邹韬奋，使出了种种伎俩，但都被邹韬奋拒绝了。此外，他们还商议了《文艺阵地》复刊的事宜。

这天晚上，最先得到茅盾来重庆消息的朋友们：郭沫若、田汉、阳翰笙、老舍等，络绎不绝地爬上茅盾住的小阁楼来看望他。大家七嘴八舌，主要是想听听茅盾介绍延安的情况，和那里熟人的消息。田汉当时就邀请茅盾参加12月2日、在天官府街文化工作委员会内召开的戏剧座谈会，田汉对茅盾说，借此机会可与重庆的新老朋友见见面，茅盾微笑着颌首允诺。

茅盾夫妇在生活书店阁楼住了三天，于12月1日搬到了观音岩坡下的枣子岚垭良庄。这是一栋坐落在被当地人称作马鞍山的小山坡上的小楼，屋主是四川人，与四川军政界有关系。小楼共三层，每层有大小三间房。一楼房东自己住，二楼沈钧儒和他的儿子女儿住，三楼茅盾夫妇住了一大间，另外一家房客王炳南和他的德国夫人安娜也住在三楼。

家具很简陋，一张双人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这些都是从生活书店暂时借来的，他们打算以后陆续添置一些。因为重庆屡遭日机轰炸，窗玻璃全碎了，有完整窗玻璃的房子已不多见，买不到玻璃只得糊上白纸。

搬到枣子岚垭良庄不久，茅盾的顶头上司、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约见他。茅盾以为这无非是官样文章，但却又必须去应酬一下。会见中，谁料这位党国大员却不打官腔，而是和茅盾拉起了家常。最出乎茅盾意料之外的是，



张部长竟向茅盾提起他的母亲，对沈老夫人的去世表示哀悼，也表示敬佩。张治中说：“令堂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也是旧中国一位了不起的女性！”这令茅盾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张治中怎么会了解他的母亲。后来茅盾才知道，原来张治中读了他妻弟孔令境，发表在上海报纸上的那篇文章：《记一个作家的母亲》。这件小事，让茅盾对这位国民党大员有了新的看法：此非庸碌之辈，而是个有头脑有识见之人。



沈钧儒良庄院子的大门

正当茅盾一步步展开工作之际，1941年1月7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还在1940年12月，茅盾从徐冰那里、也从沈钧儒那里得知，国共之间最近有严重磨擦，国民党借口执行军令军纪，要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撤到黄河以北。共产党则据理驳斥国民党限令北移的荒谬命令，指出，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策动新的反共高潮，为其投降日寇，联合剿共作准备。最后，共产党顾全大局让了一步，同意把长江以南的新四军调往江北。当时，茅盾他们以为，时局或许可缓和一段时间，殊不知国民党背信弃义，向奉命北移的新四军举起了屠刀。

“皖南事变”的消息，茅盾是在1月17日晚听到的。沈钧儒专门上楼来告诉他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茅盾惊愕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定了定神喃喃道：“老蒋这种做法是不打算抗日了，他不给自己留一点退路。”沈钧儒说：“是呀，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内战的局面，共产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第二天，重庆各大报登出了为整饬军纪，解散新四军的头条新闻。而《新华日报》则在两大块天窗上印了周恩来的悼词：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下午，作家叶以群来到良庄，向茅盾讲了当日《新华日报》出版的经过，以及周恩来和办事处的同志，亲自上街卖报并发表即席讲演等情形。以群说：“现在中央的应变方针尚未收到，估计一两天内恩来同志或徐冰同志会向你传达的。不过，我们也要作好大变动的准备。”

大约在1月23或24日，周恩来约见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介绍了这次事变的前因后果，以及中共中央的严正立场，宣读了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一个谈话：

告诫国民党，如若怙恶不悛，不思回头，中共和全国人民有责任、也完全有能力挺身而出，收拾残局，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徐冰向茅盾打了招呼，蒋介石发动的这次反共高潮有两种前途：一是内战；一是我们打退了反共高潮，继续维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局面。我们力争第二种前途，但不是妥协让步，而是针锋相对，通过斗争以求团结。徐冰告诉茅盾，周恩来同志认为，即使争取到第二种前途，今后重庆的环境必然会更加险恶，斗争将更加复杂。目前，重庆的文化人太集中了，为防意外的变故，需要作适当的疏散。一部分留下坚持工作，一部分去延安，一部分去香港。徐冰说：“经初步研究，郭沫若留下，你刚从延安来，目标太大，想让你暂时躲避一下。什么时候走，去什么地方还没有定，想听听你的意见。”茅盾说：“我服从组织的安排，去那里都一样，请你们决定吧。”

2月4日起，连续发生了《新华日报》被无理没收，报童遭殴捕，乃至《新华日报》发行所被特务捣毁等事件。2月5日晨，洪深一家五口吞药自裁，遗书中写道：“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洪深一家从死亡边缘被抢救了回来，然而，这样一位闻名全国的教授、学者和戏剧家，却被迫走此绝路，不正说明了大后方政治的黑暗，社会的畸形，人性的被摧残吗？茅盾在深切同情洪深的同时，又认为他毕竟太悲观了。

“皖南事变”之后，陪都文艺界的一切活动都停顿了，茅盾不再参加集会，也不写文章了，一时间万马齐喑，气氛肃杀。“皖南事变”让茅盾义愤填胸，洪深的自杀又使他感慨万端，虽然文网森严，令他窒息，但他要发出怒吼，一吐心中的块垒。于是，他写了一篇针对“皖南事变”的杂感，题为《雾中偶记》。借雾来嘲讽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并预言黑暗统治将像雾一样消散，“朗天化日”是会到来的。不妨摘录几段精彩的描述：

前两天天气奇寒，似乎天要变了，果然昨夜就刮起大风来……

不过这里重庆是“温暖”的，不见枯草，……而且是在雾季，被人“祝福”的雾是会迷蒙了一切，美的，丑的，荒淫无耻的，以及严肃的工作。……在雾季，重庆是活跃的，……是活动的万花筒：奸商、小偷、大盗、汉奸、狞笑、恶眼、悲愤、无耻、奇冤、一切，而且还有沉默。

于是我又想起了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鲁迅先生说过那样意思的话：血的淤积，青年的血，使他窒息，于无奈何之际，他从血的淤积中挖一个小孔，喘一口气。这几年来，青年的血太多了。……但历史还是依照它的法则向前。最后的胜利一定要来而且是我们的。

……浓雾之后，朗天化日也跟着来。祝福可敬的朋友们，血不会是永远没有代价的！民族解放的斗争，不达目的不止，还有成千成万的战士们还没有死呢！